

唐書本紀卷第一

監修國史權誠守節保運功臣持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燕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

劉 昫 等奉勅修

皇明奉

勅撰晉南徵學政山西道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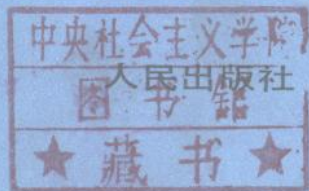
蘇州府儒學訓導門人嘉興沈桐同校

高祖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其先隴西狄道人京武昭王
高七代孫也高生歡歡生重耳仕魏爲私農太守重耳生熙爲金門
鎮將領蒙傑鎮武川因家焉儀鳳中追尊宣皇帝肥生天錫仕魏爲
懷王大統中贈司空儀鳳中追尊光皇帝皇祖諱虎後衛左僕射封
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孤信等以功來佐命當
時稱爲八柱國家仍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諡曰襄至隋
文帝作相選授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諡曰永康皇帝

《旧唐书》与《新唐书》

黄永年 著



祖国丛书

K242.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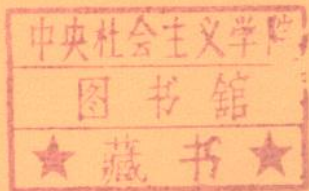
59682

祖国丛书

《旧唐书》与《新唐书》

黄永年著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郭振华

《旧唐书》与《新唐书》

JIUTANGSHU YU XINTANGSHU

黄永年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85年6月第1版

2.75印张 50,000字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3,000

书号11001·769

定价0.46元

目 录

- 为什么要介绍这两部书…… (1)
- 唐人怎样修本朝史 …………… (8)
- 《旧唐书》的纂修 …………… (24)
- 纂修新唐书 …………… (38)
- 怎样读这两部书…………… (55)
- 应该参考哪些书…………… (75)
- 用哪个本子好…………… (81)

为什么要介绍这两部书

这里要给读者介绍两部历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前一部是五代后晋时人编写的，后一部是北宋人编写的，都是记述唐代历史的旧史书，在旧时代称之为“正史”，和其他“正史”《史记》、《汉书》等一共二十四种合成《二十四史》。

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是新社会，应该看新的历史书，看用马克思主义来编写的新历史书，介绍封建社会的这些旧史书干什么？”也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旧史书都是所谓‘正史’，是封建帝王的家谱，是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难道今天还有用处，为什么不介绍点民间编写的野史？”“要知道唐代的历史，应该到西安去看唐代的文物，多形象，多具体，介绍这些旧书本有什么用？”

问题都提得很好，在没有作正式介绍之前，应该先对这些问题和读者交换一下看法。

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新历史书，可以向我们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正确地总结前人的经验，当然比旧史书高明，但是任何一本新史书都离不开旧史书，因为新史书引证的史料、描述的史实都取材于旧史书，现代人再怎样聪明，

也决不能凭空想象出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就以《旧唐书》和《新唐书》来说，如果这两部书失传了，其他有关唐代的文献和史料也统统失传了，那到今天恐怕连唐太宗是谁，武则天是谁，都闹不清楚，还谈得上编写新的唐史吗？新的历史书只是用马克思主义把旧文献旧史料作一番分析，从而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而已。历史事实的本身，还得依靠旧文献旧史料提供。

有了新的唐史，是否就可以不读旧文献旧史料，不读《旧唐书》、《新唐书》了？如果你只要求知道一点唐代起码的历史知识，读一本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便可以了，连专门论述唐代的著作都不用读，更不必读什么《旧唐书》、《新唐书》。但如果你要知道得详细一点，深入一点，教科书就不够了。专门论著呢？在某一个问题上可能讲得比较详细，比较深入，但还有更多的问题没有人写过专门论著。何况，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都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作更深入的探讨，就算教科书和专门论著都写对了，也不能到此为止，何况有时还不一定讲得对，这都需要我们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和其它文献史料，继续做研究工作。大学里要办历史系，还要招收研究生，就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认为，青年人如果真对祖国的历史有兴趣，对唐代历史有兴趣，就应该在文献史料上多下些功夫，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出更好的新教科书、新论著，不要以读几本现成的教科书为满足。

现在再说《旧唐书》、《新唐书》本身。这两部书是“正

史”，而且还是政府出面纂修的所谓“官修”的“正史”。但是否这就可以说都是帝王的家谱，都是在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呢？恐怕不能这么说。所谓“正史”，其实本来只是纪传体的史书，这是我国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而为后来许多史学家所沿用的一种史书体裁。它一般包括“本纪”、“志”（在《史记》里叫做“书”）、“表”、“列传”四大部分，后来有的没有表，有的连志也不曾写，但本纪和列传一直都是有的，因此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名著《史通》里就称这种体裁的史书为纪传体。为了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些，我们可以分别看一看本纪、志、表、列传，看看是不是都是在给帝王修家谱，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本纪，通常也简称为“纪”，是以皇帝的年号来纪年的编年史，如唐太宗贞观元年正月某日有什么事，二月某日有什么事之类，通常一个皇帝编写一个本纪，粗看上去真有点象给皇帝树碑立传的样子。其实，当时我国并没有采用公元纪年，不用皇帝的年号来纪年能用什么呢？而且本纪里按年按月按日记载的一般都是国家大事，讲到皇帝本身也因为皇帝在封建社会里是中央政权的首脑，重大的措施要以皇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至于皇帝个人的品德、生活等实际上很少讲到，即使开国皇帝如唐高祖在没有当上皇帝前也主要讲他如何积蓄力量，如何取得政权，对其家庭出身、个人品德、私人生活等等只捎带说了一点，不能说这就是皇帝的传记或家谱。相反，正是依靠本纪这种体裁，才使我国保存了历时二千多年不间断的编年史，其他各种编年史的编

写，多少都要参考纪传体“正史”中的本纪。

志，是关于皇家的礼乐制度、服饰制度、职官设置、军队编组、法令修订等过去的所谓“典章制度”的分类记述，而且还分类记述了天文、历法、地理、水利、财经、图书等各个方面，人们通过这些志可以对当时的社会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当然，记述这些典章制度的还有其他专书，但全面系统而且头绪清楚的应首推“正史”里的志。这些志根本不讲个人的事情，当然也说不上为谁树碑立传。

表，在《新唐书》里有四种：宰相表是用表的方式按年记述宰相的任命、免职或死亡；方镇表是按年记述各个节度使管区的设置和分并，这都是研究唐代政治的有用史料，并非为个人树碑立传或编家谱。只有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才分别记述了皇室李姓的宗族分支和做过宰相的人的宗族分支，包括他们的父亲、祖父、曾祖、高祖等等是谁，儿子、孙子、重孙等等又是谁，倒可以说是家谱。但这种表对历史研究也大有用处，因为自从魏晋时代出现享有经济、政治特权的世族地主以来，某地某家族为了证明自己是世族而不是受人轻视的庶族身份，都纷纷编写甚至伪造家谱，到唐代时这个风气仍未完全衰竭，《新唐书》正是根据这些家谱编制世系表的。所以，这就为我们查考谁是世族谁是庶族提供了方便，甚至有许多不见于列传的人也可以在表里找到，此外表中并不存在什么歌颂阿谀之词。

列传，也简称为“传”，占的篇幅最多，后人把它区别为“专传”、“类传”和所谓“四裔传”几部分。专传是给有关系、

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立传。类传是以类相从，也就是把同一类的人排到一起立传，如《旧唐书》就有后妃、皇子、外戚、宦官、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伎、隐逸、烈女等类传。所谓四裔传则是给兄弟民族和外国立传。至于将相大臣，要有关系、有影响的才立传，非将相大臣只要有关系或有特殊言行的也给立传，有的立专传，有的入类传。当然，被立传的大多数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这是时代的局限，怎么可能要求旧时代的史官给劳动人民立传呢？但他们对这些统治阶级的人物也并非一味说好话，在传里有时也指出他们在品德上、生活上的问题，有些类传如酷吏传、宦官传以及某些专传更是用否定的口气来写的，没有歌颂，只有谴责。

可见当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给帝王修家谱，给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用本纪、志、表、列传这四种体裁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称它为“正史”，也无非因为它在体裁上比其他史书来得全面，是官修的，或被官方承认的，并不意味着因此就把其他史书斥为“不正之史”或“邪史”。这种体裁全面的纪传体“正史”的出现，应该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事情，西方国家在封建时代就没有这样体裁全面、内容详尽的史书。当然，包括《旧唐书》和《新唐书》在内的“正史”，的确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处，只要我们注意分析，在运用和阅读时，我以为是不难剔除和摒弃的。

至于所谓“野史”，一般是指杂史、杂记、小说之类。它

表面上好象出于民间，其实仍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士大夫官僚们写的，不过是私人记述而已。就阶级立场来说，和官修的“正史”没有多大差别。而且，这些野史多半是故事性的片断记述，其中固然有当事人口述手写的比较可信的史料，但出于道听途说的也为数不少，不仅远不如“正史”记述全面，而且准确性还常成问题。当然，有些官修“正史”不便记述的东西可能在野史里谈到，有选择地用野史来补“正史”之缺是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夸大野史的作用，提倡读野史而不要读“正史”，就不对了。

保存下来的或新出土的历史文物当然也很有用。现在的西安市因为是唐皇朝京城长安的所在地，在市区以及邻近的几个县里的唐代文物就特别多。如市区的陕西省博物馆保存着大量唐代碑刻和近年来出土的唐三彩明器、铜镜、金银用器；礼泉县的昭陵博物馆保存着唐太宗手下许多文臣武将的墓碑、墓志；乾县的乾陵博物馆不仅修缮了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供人们游览，还打开了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孙子懿德太子李重润和孙女永泰公主李仙蕙的三个墓道，让人们参观其中的壁画和明器群。从这些明器、壁画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衣服、装饰，骑的马和骆驼是什么样子，怎样打猎、打球，怎样玩乐。墓碑和墓志上提供的史料有时还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但所有这些都毕竟太片面、太零星，成不了体系。如果不依靠《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连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以至高宗、武则天是何等样人都不知道，光凭几块墓志和壁画、明

器等文物是不能把当时的历史弄得一清二楚的。文物只能用来补充“正史”，印证“正史”，或者使“正史”更形象化，但终究代替不了“正史”。要研究唐代历史，主要还得依靠“正史”中的《旧唐书》和《新唐书》。

老一辈的史学家为我们利用“正史”做出了典范，他们在研究某一个朝代的历史时，首先都要把这个朝代的“正史”下苦功研读一番，然后再参考其他有关的史料和文物。如已故吕思勉先生的两厚本《隋唐五代史》，已故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是主要利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其他“正史”提供的史料写成的。这种踏实的好学风、好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唐人怎样修本朝史

《二十四史》不论是官修的，还是象《史记》、《汉书》那样是私人纂修的，一般只写上一个作者的姓名，最多也只写两个。如《新唐书》的作者写欧阳修、宋祁；《旧唐书》作者写刘昫(xù序)。不过因为是官修，在姓名下面还加个“等”字，私人纂修的就连“等”字也没有了。我小时候总惊叹这些人本领那么大，一个人或几个人竟能写出上百卷，甚至几百卷的大书。后来才知道其实不然。就“正史”的头一部《史记》来说，实际上并不能说是司马迁一个人的成绩，其中好些篇在他父亲司马谈手里已经写出来了。班固的《汉书》也是这样，开头一部分采用了《史记》的现成文字，他父亲班彪也写了几十篇，《汉书》是在此基础上编写成的，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妹妹班昭等写完。官修的更不用说了，别看在作者姓名后面加个“等”字，这一个“等”往往包括了好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因为人太多了，所以编写完工进呈给皇帝时只写上一个领头者的姓名，而这个领头者又往往是宰相。有的还能真正负责，有的只是挂名。如《宋史》、《辽史》、《金史》的挂名作者宰相脱脱，是蒙古族人，不懂汉

文，实际上出力的是名字没有写在书上的一批人。

编写“正史”的人从来都不是凭空动笔的。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形成了一个传统习惯，一个朝代的“正史”要在这个朝代灭亡后由下一个朝代的人来编写。如《旧唐书》是在五代的后晋朝才编写成的，这时离开唐亡已将近四十年，离开唐初也有三百多年了，《新唐书》的编写更迟至北宋中叶，比编成《旧唐书》还要晚一百年左右。读者们试想，这么久远以前的事情编写者怎么能弄得清楚呢？怎么会记得住呢？尤其是本纪，是要按年按月按日记载国家大事，这么详细的事情谁会记得清呢？好在我国自古就有档案保管制度。早在古老的商、周时候，已有了记录国家大事、保管文书档案的人员。据说经孔子加工过的《春秋》这部史书，它的前身就是春秋时鲁国史官按年月日记录下来的历史档案。这种设置史官记录本国本朝历史的工作一直受到统治者重视，每个朝代都认真地去做，而且在制度和办法上越来越完善，从而准备好大量资料以至半成品，这些都成为下一个朝代的人修史的依据。可见，一部“正史”之所以能编写出来，与上一个朝代的史官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直接编写者当然也很辛苦，但多半是在充实改造前朝史官已取得成果上下功夫。无怪乎人们常称这些编写者是在纂修“正史”，“纂”是编集的意思，“修”是整治的意思，都不是说他们是白手起家。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旧唐书》、《新唐书》的纂修者和纂修过程之前，应该先给读者介绍一下唐朝人修本朝史的情

况，介绍纂修《唐书》利用了哪些资料和半成品。另外，要介绍唐朝人怎样修本朝史，还要讲讲当时的修史机构、人员编制和职责范围。

在隋朝时，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老传统，史官归秘书省^①管辖。在秘书省下设立著作曹^②，曹里有两名著作郎，八名著作佐郎，这些就是当时的史官。修史工作常由大臣领导，叫做“监修”。隋炀帝时，又另外设置了两名起居舍人，直接记录皇帝的言行，归当时中央的最高行政机构三省^③中的内书省管辖。唐皇朝建立之初，因为忙于进行统一战争，所以除把内书省恢复为隋文帝时的内史省（以后又改为中书省）外，对起居舍人和著作郎、佐郎的设置没有变动。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颇有作为而且重视修史的皇帝，他把记录皇帝言行的事情移归门下省来管，在门下省又设置两名起居郎具体做这项工作。高宗时候，又把皇帝言行的记录加以分工，让起居郎专管记录皇帝的“行”；对负责皇帝“言”的人，则恢复了起居舍人的名称，在中书省设置两名起居舍人来专门记录。这是记录皇帝言行的制度的一个变化。

记录皇帝的言和行，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是连皇帝私生活里的一言一行都要记录。这些鸡毛蒜皮甚至不便公开的私生活是不好记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没有资格进入深宫

① “省”在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央机构的名称，元代时由于在地方上分设了“行中书省”，“省”才逐渐变成了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

② “曹”也是当时的机构名称。

③ 隋以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为三省，隋炀帝以内史省为内书省，这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唐代基本上继承了这种三省制度。

里去记(只有宦官才许可在深宫里伏侍皇帝和后妃)。他们所记的只是皇帝处理国家大事时的言行。据记载,皇帝上朝时,起居郎先是随百官朝见,待百官退出后,在皇帝和宰相议论国家大事时,由一名起居郎执笔记录,后面还跟随着属于史馆编制的史官。在添设了起居舍人后,起居舍人就和起居郎一起携带着笔墨跟随宰相上朝,起居郎在左边记事,起居舍人在右边记言。起居郎按年月日记下了国家大事,还要编成一种内容极其详细的编年记载叫做“起居注”。所谓“起居”,就是指皇帝的一举一动,“注”,就是记载的意思。起居舍人记的“言”实际上就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当时按照不同的用途有“诏”、“制”、“敕”、“册”、“赦”、“德音”、“批答”等种种名称,通称之为“诏令”,由起居舍人把它汇集起来。无论是起居注还是诏令,都得按一年四个季度编写成卷,每当季度终了就要送进史馆保存。

以后除了起居注和汇集的诏令外还出现过一种名叫“时政记”的东西。这是由于宰相和皇帝议论的内容,有许多事关国家机密,而常常又是些仅仅处于考虑阶段还没有正式下命令的事情,如果让在场的起居郎、起居舍人记录下来,万一泄漏出去很不好办。于是在高宗后期作了个新决定,叫起居郎、起居舍人随百官退朝,皇帝和宰相讨论的机密事项不再让他们知道。但这样一来,有许多涉及机密的国家大事就无法及时写进起居注里,起居郎只好根据事后公开的诏令在起居注里作点记载,这自然很不详备。因此,在武则天做皇帝时又有人建议,让一位宰相把议论的国

家大事记下来直接送到史馆，每个月送一次，这就叫做时政记。可有些事情宰相也不便记，再加上因为牵涉到不少人事关系，所记的也未必都很真实，所以不久就作罢了。以后在德宗和武宗时又曾相继恢复过这种记时政记的办法，在文宗时也恢复过让起居郎、起居舍人跟随宰相记录的制度，宣宗时还规定宰相们对国家大事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写各的以防一个宰相写时政记有片面或遗漏之处。可见当时对记录国家大事这项工作确实做得比较认真。只是既要记得完备无遗，又要保密，这个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解决。

起居注、时政记和大批的诏令送到史馆后不仅仅是为了存档，更重要的是为了给纂修本朝史提供资料。纂修本朝史的工作在隋朝是由史官著作郎、佐郎们承担的。前面说过，这些著作郎、佐郎属于秘书省的著作曹，而秘书省设在皇城，和其他大小政府机构混杂在一起。到唐太宗时，可能为了提高史官的地位，也可能为了保密，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把史馆设到皇帝所住的宫城——当时通称为“大内”的里边。大内里只有两个最重要的政府机构即三省中的门下省和中书省，中书省在西，门下省在东，太宗把史馆安在门下省的北面。同时在史官的设置上也作了一次大变动，秘书省的著作局专管做碑文和做祭祀用的祝文、祭文，不再担任修史的工作。修史的工作改由史馆里设置的两名到三名史官去做。这几名史官不是专职的，他们往往原来有别的职务，以后才被派到史馆里去修史，有时也调著作郎、起居郎兼任史官修史。同时，还加派一位宰相来兼做监

修工作。这种由宰相来领衔修史的办法从唐朝一直延续下去，成为定制。

贞观时在长安城东北角利用龙首原的高旷地势，按照宫城的规格建造了大明宫。高宗有风痹病，嫌宫城太低下潮湿，所以就住到了大明宫里。史馆也因此跟着中书省、门下省搬进大明宫，不过不在门下省北而是移到了省南。高宗在其后期和武则天在掌权做皇帝时都长期住在当时的东都洛阳。洛阳城也象长安一样有宫城、皇城，在宫城里也设有史馆。以后皇帝搬长安，史馆又跟着回到了大明宫。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因考虑到宰相商量国家大事的政事堂设在中书省，史馆如在附近工作就比较方便，所以又再次把它搬到中书省北边。

在这以后，史官也有了名称，一般都叫“史馆修撰”，初入史馆的叫“直馆”。宪宗时，修撰这个名称又被专门用来称呼以朝官身份入史馆工作的人，不是朝官而入史馆的才叫直馆，修撰中又设一名由官职较高的人充任的“判馆事”，即主持史馆工作的意思。

以上这一系列措施，都说明唐朝的统治者对史馆十分重视，否则就不会把它从秘书省里独立出来。独立了的史馆如果是无关紧要的冷衙门，也不会把它搬来搬去而且越来越向政治核心靠拢，更不会去健全史馆的编制，并让宰相监修成为制度。

当时史馆的工作，主要有两项：

一是修“实录”。因为每季度送到史馆来的起居注和诏